

如何與中學生談中華文化

盧鳴東博士

緒言：中華文化與文化生活

唐君毅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指出：中國所謂文化者，人文之化成於天下也。文必附乎質，質必顯乎文。日常生活為質，精神文化生活為文。文質相麗而不相離，即中國文化之精神之一端。

古往今來，平凡的生活內容諸如起居飲食、服飾器具、勞動生產，皆是個人親身體驗生命的最佳方法。生活是一個民族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們賴以為生，保存種族生命，是實踐文明進化的主要工具。正因為如此，生活是經過先民點滴積聚的文化淵藪，具有延續性、可變性、包容性、平易性、實踐性等特質，猶如一道往返古今未來的時光隧道，讓我們通過典籍的記載走進古人的世界裏，認識文化本身的流變，又讓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追溯、印證文化的真實存在，為未來建設更美好的精神素質。

在課堂學習以外，除了安排學生到博物館、文化中心、劇院或音樂廳，去參加各種文化講座或活動外，教師如何引導學生親近文化，啟發他們透過實際生活，增強對中華文化的敏感度，建構出個人的文化生活呢？我認為應該以學生為根本，引導他們關注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各種事物，從親身體驗、經歷、思考和判斷接觸中華文化。畢竟，中華文化底蘊豐厚，包羅萬象，絕非朝夕可致，兼且文化的泉源來自人們生活，要理解文化本身的內容，揭示它們的現世價值，必須要靈活地融入今日社會中，通過在生活上多方面的考察和分析，認識我國文化優秀所在，同時承認箇中不足之處，提出修正和補充。今日我們向中學生教授中華文化，目的是讓學生秉持終身學習的態度，啟導他們對周遭事物培養出興趣，進而聯繫到中華文化的內涵，自學反思，躬身求知，而不是傳授專門為了滿足學科要求，只求分數所要學會的一堆雜亂內容。

中西思維方式比較

要與學生談中華文化，首要踏出的第一步，不是竭盡所能向他們介紹中華文化的所有知識，而是先讓他們把握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捉緊古人在文化溝通上的表達形式。思維方式是指人們的思維習慣或思維程序，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思維方式必存在一定差異。比較來說，中國偏好形象思維，而西方偏好抽象思維或邏輯思維。由於文化是人們通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集體成果，因此，文化的表達形式是由思維方式來決定。

西方思維方式求其客觀準確，而中國多是心中體會，直覺體悟事物的性質，例如孔子說「仁」：

《論語·雍也》曰：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說文解字》曰：「譬，喻也。」徐鍇《繫傳》曰：「譬，猶匹也，匹而喻之也。」

《論語·顏淵》曰：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直覺體悟依靠自身的知識和生活經驗，而對事物作出判斷。在《論語》中，孔子沒有直接註明「仁」的實在意義，亦沒有採用任何分析方法剖析「仁」的內涵，他期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體悟出「仁」的真諦。

此外，中國思維方式着眼於我們對事物關係的判斷，事物之間有無關係，或關係何在，都取決於我們的關聯性思考。例如孔子說到治國之道：

《論語·為政》曰：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關聯取譬，是憑藉主客二者相通之處作比喻，闡釋事物的本質。孔子認為治國在於以仁德為政，如果國君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像北辰星般受到眾星圍繞一樣，得到所有臣民擁戴，長治久安。這裏便是以星辰譬喻出「為政以德」的道理。

中國思維方式不執着於知識性、理性精神的傳授，而重視自身感受和生活體驗的積累。我們再看元代馬致遠的文學作品：

《天淨沙·秋思》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這是以人心構成形象的例子，中國傳統沒有將把握外物的形象作為認識目的，而是要求把整個身心融入萬物，用生命去體驗和感悟整個宇宙，作為意象生成的要求。文字配合圖像的映照，我們可以感受到羈旅者的心情，以及時空中悲涼氣氛的渲染。相反，西方的意象生成在摹象的基礎上，注重對外物的認識和理性把握，力圖準確地再現事物的形象，從而理解和掌握客觀世界。美國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1885-1972）在其作品《詩章》中的一首詩：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在一個地鐵車站

人群中這些面孔幽靈般顯現；
濕漉漉的黑枝條上朵朵花瓣。

西方意象是各種根本不同概念的聯合，詩的任務就是準確地再現各種客觀個別的事物。

學生能分別出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有利於理解語言表達的形式和內容，對認識中華文化內容起到一定幫助。在這基礎上，教師可以向學生提出問題，例如中國思維方式有何不足之處？對我們理解中華文化會否造成影響？讓學生反思。

古今生活習俗對照

「文化」一詞最早記載於漢代文獻中。劉向在《說苑·指武》中指出：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這裏「文化」所指的是文治教化，與今日的意義顯然不同。根據英國學者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 年) 在《原始文化》中說：

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複雜整體。

中華文化內涵有寬廣的延伸性，要是在課堂上逐一向學生講解根本不大可能。由於文化本身具有延續性的特質，它是一個民族在實際生活中長期積累的成果，經過不斷的仿造、變化和沉澱，一直保存至今。因此，在今日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一些耳熟能詳的名稱，涉及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內容，實際上有更早的源頭，可以引發起學生的興趣，讓他們追溯傳統，就其所見所聞，對照古今，品評得失。

例如周代所制定的「媒人」制度，時至今日，其職能已發展為具有商業性質的婚姻介紹所，此一文化制度歷經變遷，實乃形成於周代官職制度。

《周禮·地官·媒氏》曰：

媒氏：掌萬民之判。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鄭玄注曰：「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

《詩經·衛風·氓》曰：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我們今日所熟悉的「媒人」這個詞語，最早載於《古樂府詩·孔雀東南飛·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說明它在漢代已經出現。媒人本來是周代的一個官職，最初稱為「媒氏」，職責比起今日的「媒人」複雜得多，後來更分為「官媒」和「私媒」兩種，歷代更有「伐柯人」、「冰人」、「月老」、「紅娘」等不同稱呼。

「媒人」這種文化制度傳承至今，歷經不少變化，二千多年來，就其本身得失優劣的評價不少，教師可以作為課堂討論或辯論的題材，使學生在認識中華文化之餘，培養出個人的分析能力和判別能力。例如，我們可以先提供一些古代文獻資料給學生閱讀和反思：

《戰國策·燕策·卷二十九》記載：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詆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詆者耳。」王曰：「善矣。」

然後引導學生闡述「媒人」制度的內容、變化和品評優劣，亦可對照今日婚姻介紹所反映的社會文化或存在的問題。最後，由教師或師生共同總結這種制度文化在今日社會中的價值和意義。

生命價值觀

中華文化含有關愛人們生命的優良美德，特別是傳統儒家文化抱有仁民愛物，普濟天下的理想，提供人們處世的方法和生命價值觀。從小開始，及至終老，人們處身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中，加上各人身分階級、社會地位迥異，對事物觀感都會存在不一樣的看法，蘊含着高低不等的價值觀。這種從生活歷程中活現出來

的價值觀，指導着人們的處世態度、生命取向、取捨原則、是非判斷等生存問題，不論古今，它與中華文化的形成都有着密切的關係。

古今生活基礎，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大概不別，都是人們生存的必要條件。這是學生較易感受、體會的物象基礎，教師可將之聯繫學生身邊的事物和生活經驗，拓展寬廣的思想空間，使他們思考和判斷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劣，進而培育出正確的價值觀。

例如儒家談到「義利之辨」的問題：

《孟子·梁惠王上》曰：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告子上》曰：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論語·憲問》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論語·衛靈公》曰：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義」是儒家最重視的道德價值；「利」是世俗喜愛的金錢財富，要是於二者中作出取捨，明顯地，儒家決定了捨賤取貴，維護道德，放棄財富。在今日商品化的社會中，學生時常都會面對金錢與物質消費的取捨抉擇，由於仁義過於抽

象，不易掌握，學生的生活經驗始終有限，不易明白儒家捨身取義的內涵。教師適宜先通過角色扮演、個案分析等課堂活動，讓學生明白到「仁義」的文化概念和實踐內容。

價值觀的講授必須全面，避免學生過於黑白分明，各走極端，引起誤解。儒家重視仁義，比較少直接探討財富，但並非絕對否定財富，相反，儒家實際上是充份認識個人對財富要求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論語·子罕》曰：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論語·述而》曰：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儒家重視財富創造，主張先富後教。

《論語·子路》曰：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孟子·梁惠王上》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儒家不反對追求財富，但反對把財富作為人生追求的一的、終極的目標。

《論語·里仁》曰：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論語·述而》曰：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顏淵》曰：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儒家認為追求財富必須以遵守仁義為準則，既不以「貧窮為榮」，不以「貧窮為恥」，更不以「富貴為榮」。人要獲取財富必須具備正當性，但這不表示重德不重財，因財富能創造出理想的社會條件。

日常用語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兩者關係密切。我們日常使用的成語或流行語有助說明中華文化多個範疇，包括價值觀念、起居飲食、傳統習俗、社會制度等的形成和發展。通過語義的分析可以從多方面加深學生對在中華文化的認識。

成語是固定詞組，以四字為主，簡短有力，學生易於記誦。一般而言，成語都有出處來源，後人使用成語多採用其引申比喻義，已非單純字面的意義。例如中國人經常講「以和為貴」，這與儒家的核心思想有緊密關係。

《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鄭玄注曰：「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

就人際關係而言，能夠與人和睦相處，又不盲目苟同，這是儒家所極力倡導的。《論語·子路》曰：「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由此衍生出一些今日我們所熟悉的詞語，例如「和氣生財」、「和事老」、「心平氣和」等。這種蘊含在成語中的儒家思想，也通過語言形式的重新組合，進一步發展它的意義內涵。例如《孟子·公孫丑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致勝的各種因素中，天時有利不如地形有利，地形有利又不如得到人心，獲得人們的支持。這方面，我們可以引導學生翻查辭典，舉出更多與此相關的詞語；或引用日常生活事例，印證出儒家文化思想的存在。

例如，我們今日經常講「順得哥情失嫂意」，何以不能在「哥情」、「嫂意」任擇其一？而必要同時兼顧兩者？教師可安排學生閱讀以下數篇文章，然後加以分析、討論。

《左傳·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禮記·儒行》

言必先信，行必中正。

《禮記·喪服四制》

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

《易傳·序卦》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新聞時事與中華文化

在日常生活中，學生通過文字和電子等各種不同的媒體，可以輕易地掌握到國際和本地受矚目的新聞時事、生活課題。這些資訊給學生帶來親切感，使他們在當下已能認識到事情發生的來龍去脈，以這些材料引入教學，容易提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其實，我們可以進一步利用這些資訊，引導他們認識當中包含的一些文化意義，走進中華文化的價值觀內，以古鑒今，進而反思自己的生活或行為，並提出建議或解決方法。

例如「醉酒駕車」是學生經常都會碰到的新聞。這類意外是由於駕駛人士飲酒過度，致失去開車時應有反應和判斷能力而發生的。其實，中國關於酒的文化，源遠流長，對於飲酒量的約束，以及酗酒所造成的後果，古人作過不少論述，可以借鏡。我們可以舉出有關的新聞個案，讓學生先行閱讀、討論，然後再引用古籍文章對照說明。

《尚書·酒誥》記載了酗酒的禍害和酒的用途：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祝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尚書·酒誥》是中國古代第一篇關於酒事管理的文獻，對儒家酒德文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文中用政治意識審視酒事活動，把飲酒行為與國家治亂互相聯繫，形成儒家「飲酒亡國」論或「酒禍」論的酒德文化觀念。在儒家文獻中，也有不少勸戒人適量飲酒的文章。例如《詩經》：

《小雅·小宛》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但也有文章指出飲酒活動可以維護宗族關係，聯繫君臣情誼。

《小雅·湛露》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大雅·既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
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這裏也肯定了飲酒的正面作用，詩文中「不醉無歸」，「既醉以酒」數句，容許酒醉的發生。據這些材料，我們可以讓學生討論：儒家反對人們酗酒，卻又容許酒醉，當中是否存在矛盾？古代士人每當失意，偏向借酒消愁，究竟酒在中華文化中是帶有積極意義，還是消極意義？這些問題，都能刺激學生更深入地思考中國的酒文化。